

团结出版社

下卷

乌东峰 王国宇 等著

毛泽东时代



法国前总统德斯坦1983年6月在上海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谈到：很多外国元首都被人忘记了，只有毛泽东等少数人仍被人所知，是因为『毛泽东体现了一种哲学思想』，『毛泽东思想正是使中国走向一种哲学，即给予中国人民最大的权力和最高的地位』。

1959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他和毛泽东首先想谈的居然不是两国关系的重大问题，而是哲学问题。他对毛泽东说：『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

一种哲学成就的一个伟大时代

毛泽东时代

朱有志 主编

乌东峰

王国宇

等著「下卷」

团结出版社



目 录

下卷

第1章 争取和平

- 一 毅然决策：“我准备坐班房，重庆必须去” 1
- 二 重庆谈判，“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 10
- 三 聚会在“民主之家”，“我们深深地感到了人民的支持” 18
- 四 奋起自卫，“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 25
- 五 一片诚心，“我也准备参加国民政府，作个委员” 30
- 六 向北发展，“只要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38
- 七 和平远去，内战难免，“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 44

第2章 转战陕北

- 一 面临内战全面爆发，“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53
- 二 大军压境，“我要最后一个撤离延安” 60
- 三 和敌人转圈子，“不把他拖死，也把他拖垮” 70
- 四 三军配合，两翼牵制，“主力打到外线去” 75
- 五 发表人民解放军宣言，“革命战争达到了一个转折点” 84
- 六 东渡黄河，“到了晋察冀，就像当年在江西兴国一样” 88

第3章 决战决胜

- 一 关门打狗，“封闭蒋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 95

二 逐鹿中原,“一锅夹生饭,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	104
三 决胜华北,“先打两头,后取中间”	115
四 揭穿美、蒋阴谋,“我看蒋介石还有多大本事”	126
五 进军新疆、西藏,“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	134

第4章 筹建新中国

一 组成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43
二 政治协商:“要一致,要合作”	147
三 北平“赶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151
四 密驻香山笑迎八方客,“我们都是老朋友了”	157
五 设计蓝图:“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162
六 确立“共同纲领”:“建设独立民主和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166
七 开国大典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170

第5章 巩固新政权

一 统一财政,“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176
二 天下初定,“我们不要四面出击,不可树敌太多”	179
三 剿匪镇反,“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有奖”	183
四 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过好土改关,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	190
五 处理刘、张案件,“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	195
六 打击“五毒”——“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	201
七 处理高、饶问题,“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	206

第6章 外结友邦

一 开国外交:“另起炉灶”,“倒向社会主义一边”	215
二 出访苏联,要搞出一个“既好吃,又好看”的东西	223
三 抗美援朝,“侵略者应当懂得中国人民是惹不得的”	230

四	打破遏制,“应当把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	238
五	台湾是中国领土,“中国人民的主权和内政绝不允许他国干涉”	242
六	再度访苏,“荷花虽好,也得绿叶扶持”	248

第7章 艰辛开拓

一	过渡时期,“基本上完成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	256
二	一桩公案,“为人民的长远利益才是大仁政”	262
三	制定宪法草案,“看样子是得人心的”	269
四	办农业合作社,“那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276
五	对手工业改造,“不能搞得太慢了”	289
六	关于私营工商业改造,“人们考虑的不外是一个饭碗、一张选票”	293

第8章 思想批判

一	思想改造运动,“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	304
二	评价武训,“重要的是我们共产党人怎样看待这件事”	308
三	向红学权威开火,“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	313
四	批判胡适,“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	318
五	错批胡风,“此事请你调查下,以其情形告我”	327

第9章 花甲壮心

一	以苏联为鉴戒,“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	338
二	中共八大,“中国几十年才能将穷鬼送走”	346
三	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	354
四	从“整风”到“反右”,“事情正在起变化”	362
五	急于“大跃进”,“我就不信,搞建设比打仗还难”	373
六	办人民公社,“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389
七	炮击金门,“打而不登”	399

第10章 睿智深谋

- 一 领导层的一线二线,“我想把整个中国要紧的事办定” 412
- 二 庐山会议,“彭老总批给我看的尽是消极材料” 417
- 三 共渡难关,“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 436
- 四 实事求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442
- 五 七千人大会,“白天出气,晚上看戏” 451

第11章 淡定自强

- 一 防止和平演变,“乱云飞渡仍从容” 465
- 二 两弹一星,“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478
- 三 印度蓄意挑起武装冲突,“来而不往非礼也” 485
- 四 自力更生,“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497
- 五 培养接班人,“死了张屠夫,就吃活毛猪” 508
- 六 接见溥仪、李宗仁,皇上总统“来去自由嘛” 521

第12章 戎装再着

- 一 批判《海瑞罢官》,“山雨欲来风满楼” 535
- 二 狂飙骤起,江青“为了打鬼,借助钟馗” 547
- 三 避居“西方山洞”,“凭阑静听潇潇雨” 555
- 四 “文革”全面发动,“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565
- 五 “红卫兵”运动如火如荼,“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 572

第13章 种龙得蚤

- 一 少奇蒙受奇冤,“刀下留人” 583
- 二 号召上山下乡,“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 598
- 三 斗则必胜,“珍宝岛就破除了迷信” 606

四	召开中共九大,“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	617
五	与林彪较量,“一滴酒精下去,细菌就不活动了”	623
六	林彪折戟沉沙,“我种下的龙种,收割的却是跳蚤”	635

第 14 章 毫厘决策

一	悲咽陈毅,“他是一个好同志”	661
二	调整文艺政策,“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	666
三	乒乓外交,“小球转动了大球”	676
四	远见卓识,“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	691
五	“批林批孔”,“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699
六	力阻江青组阁,“不要搞四人帮”	712

第 15 章 天骄暮别

一	感伤周恩来辞世,“我也走不动了”	718
二	二次倒邓,“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728
三	忧虑接班,“和平不成就动荡中交”	741
四	淡看生死,“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	749

第 1 章

争取和平

1945年8月10日，当日本政府乞降的消息传到延安，解放区军民无不沉浸在无比兴奋的喜悦中。

然而，人们欢庆胜利的热泪尚未擦干，天空中又飘来了战争的乌云。

面对蒋介石一手准备内战，一手摇旗呐喊“和平建国”的策略，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面临着重大的抉择。

一 毅然决策，“我准备坐班房，重庆必须去”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当天，蒋介石便迫不及待地给毛泽东发出了和谈的邀请电报：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对于蒋介石在战争一结束便打出“和谈国事”、“和平建国”的旗号。毛泽东说：“蒋介石的主观愿望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但是要实现他的愿望，客观上有很多困难。这样，使他不能不讲现实主义。”

毛泽东在此所说蒋介石消灭共产党有很多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是此时共产党已拥有 100 万正规的人民军队，且这些军队处于十分有利的战略位置。而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大多困于西南的崇山峻岭，想立即消灭共产党也不可能。

当然，对于蒋介石来说，不用武力而通过“和谈”迫使毛泽东放弃解放区与人民武装，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早在抗日中期，他便致密信于毛泽东，要求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为此，毛泽东派林彪率代表团赴重庆与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林彪“在重庆等候了十个月”，毫无结果，只得于 1943 年 6 月底与周恩来离开重庆回到延安。张治中后来回忆说，从 1943 年共产国际解散开始，蒋介石就一直打算对共产党进行拉拢，想通过“和谈”解决中国问题，达到所谓的“军令、政令统一”。

除以上国内因素外，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会谈国事，与美、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及战后对华的外交政策亦有着极大的关系。

1945 年底，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对华政策中声明，“美国及其他联合国国家承认目前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为达到统一中国目标之恰当机构。”但美国深知国民政府是一个腐败无能、不得人心的政府，要想使国民政府在中国建立“统一的有效的统治”，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披上“自由民主”的外衣，扩大其统治基础，容纳国内其他党派参加政府。尤其想通过国民政府的所谓“民主改革”，在“和平、团结”的旗号下使中共放弃解放区，交出军队，从而建立一个表面上独立，实际上听命于美国，享有大国地位，政治、经济相对稳定的国民政府，以便遏制苏联，充当美国在远东的支柱。正是从这个目的出发，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起，对华政策由援华抗日

转变为扶蒋反共。

但鉴于中国共产党力量在抗日战争中的空前发展，如果直接实行大规模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消灭共产党，必然会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以致深陷泥潭而不能自拔。于是，美国便在对华政策上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是支持蒋介石玩弄“和谈”，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把毛泽东等人弄到国民党去做官；二是积极扶持蒋介石，由他出钱、出枪帮助蒋介石消灭毛泽东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而当时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尽管对美国的扩张政策采取了多方面的抵抗与斗争，但战争的创伤使苏联急需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因而在与美国的斗争中一方面极力维护自身的利益，同时在许多问题上采取妥协退让政策，以避免爆发新的世界大战。

在对待中国问题上，苏联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与美国的交易过程中，并未改变其支持国民党的政策。于是美国利用苏联谋求在华利益的欲望，以承认苏联对华的某些要求为条件，促使苏联领导人只支持国民党，以达到削弱中国共产党的目的。

1945年，经美国的撮合，苏联与蒋介石的代表进行了多次谈判，于8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其他附属协定，通过这些条约、协定，苏方实际上恢复了沙皇俄国时期侵略我国东北所获得的权益。为了压迫国民党政府接受，苏联表示战后只支持国民党政府。

据国民党政府的谈判记录记载，宋子文在谈判时曾非常明确地要求“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斯大林毫不含糊地声明，对于中共，“吾人并不予以支持，亦无支持彼等之意向。吾人认为中国只有一个政府，如在中国国内有另一政府，此当应由中国自身解决之问题。”斯大林还说：“关于援助一点，蒋委员长谓应给予中央政府，吾人以往即已如此，倘阁下需要吾人协助，而吾人也可能协助者，自当给予蒋委员长之政府。”

对于苏联如此明朗的许诺，美、蒋自然庆幸万分。

因此，1945年8月14日中苏条约签订的当天，蒋介石便向毛泽

东发出了“和谈”国事的邀请。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苏联政府在外交上只承认国民党政府，表明莫斯科对战后中国前途的看法。苏联人认为，战后中国仍将是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共产党人扭转不了乾坤。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苏联、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交易，毛泽东自然不得而知。凭着对国内形势的判断，毛泽东起初婉然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

8月16日，毛泽东给蒋介石复电说：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 朱铤

毛泽东在电报中未予明确表态，只提出一个条件，要求蒋介石首先对朱德的电报做出答复。朱德的电报，即8月16日毛泽东代朱德起草的那封电报，在该电报中，朱德明确要求蒋介石收回不准中共军队受降的命令，并“公开承认错误”。

在公开复电的同时，毛泽东接见了国民政府在延安的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明确告诉他们，他目前不准备离开延安，请他们转告。毛泽东之所以不愿去重庆，并非不要和平，而是因为他认为在中共力量大大弱于国民党的情况下，和平可望不可即，尤其不相信蒋介石真正有实现和平的诚意。

由于日本一投降，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凭借美国的援助，拼命地抢占抗战胜利果实并下令禁止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接受日伪军投降，所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度将内战的危险看得十分严重，认为蒋介石内战独裁的方针早就定了，他的“和平”倡议只是为了欺骗全国人民和世界舆论。为此，8月13日他在《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局和我们的方

针》中明确指出：蒋介石是一个“极端残忍和阴险”的家伙，现在要“下山”来垄断胜利果实，并有可能大举进攻解放区。对此，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首先是“集中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猛烈扩大解放区”，然后“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

然而，就在毛泽东婉拒蒋介石的邀请后，毛泽东收到了斯大林发来的电报，该电报说：

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毛泽东应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据当年的翻译师哲回忆说，毛泽东在收到斯大林的电报后，“极大不快”。他绝不同意斯大林关于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也不可能不加思考地全盘接受斯大林的意见。但莫斯科的意见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足够重视。

就在这时，毛泽东又收到了蒋介石于8月20日发来的第二封邀请函。

8月21日，上海起义即将举行前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连发两份急电给华中局，决定停止发动上海起义夺取上海的计划。

8月22日，中共中央在发给全党的指示信中，改变了夺取大城市的方针，说：“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

该指示信还说：“国民党内部困难仍多，美苏均不赞成中国打内战，我党在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下准备和国民党谈判，争取有利于我党和人民的条件。”

这封指示信标志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抗日胜利后对时局判断的

重大变化，以及中共方针的重大调整。

因此，毛泽东在发出指示信的当天，即复电蒋介石：

蒋委员长勋鉴：

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毛泽东 未养

这封复电与第一封复电相比较已有重大区别，它已明确答复蒋介石，同意和平谈判。

8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形势和应付时局的方针。

毛泽东在会上说：和平是可能取得的，因为中国人民需要和平，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

现在的情况是，我国抗日战争阶段已经结束，进入了和平建设阶段。全世界包括欧洲、东方都是如此。

我们可能在两种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了。我们曾力争在进入和平阶段前进入若干大城市，如北平、天津、太原，没有成功。

原因有二：一是苏联为了国际和平和受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帮助我们；二是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使侵华日军只向国民党军队投降，我们想争一部分受降权而不可得。加上我们自身的力量又不够强大，没有机械化军队，因此，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

根据对形势的这种判断，毛泽东提出：以“和平、民主、团结”这一新的口号代替过去“抗战、团结、进步”的口号，以争取国内外广泛的同情。

这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新方针，对此前初步做出的接受蒋介石的邀请，派毛泽东、周恩来等赴重庆谈判的决定，明确进行了肯定。不过，仍然决定：由周恩来先去重庆谈判，毛泽东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

于是在当日，毛泽东致电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为保全国团结，远东和平，鄙人亟愿至渝与蒋委员长共商大计。兹先派周恩来将军前来接洽，请转达赫尔利大使，并给交通便利为感。”

其时，蒋介石也在窥测与分析毛泽东的动静，根据其驻延安联络参谋的情报，认为毛泽东的再三推辞似有懦怯之意，并判定毛泽东不会接受他的邀请，于是他借题发挥，大做文章。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在8月21日的社论《内战不容再有》称：

“我们要请毛泽东先生惠然来渝，以事实来证明其无意于内战，以事实来慰藉热望和平幸福的全国人民。”

“希望毛先生能应邀翩然来渝，不特把久悬未决的中共问题，于开诚倾谈之下，得到合理解决；同时为今后急待展开的复员建国工作，立下一个协力共进的基础。”

次日，该报又称：“现在蒋主席已一再电促毛泽东先生来渝，共决大计，但毛泽东先生是否肯来，仍有待事实证明。”

美国《纽约时报》也发表文章说：“蒋主席邀请中国共产党领袖赴渝共商国是……自中国共产党过去情形视之，此次或将拒绝蒋主席之邀请，彼等并不愿参加合作。”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立即将此文译成中文，在好几家报纸上转载。

毛泽东究竟要不要亲自赴重庆，当时国内民众亦十分关心此问题，反对者有之，赞同者亦有之。许多人甚至忍不住公开写信致毛泽东，陈述自己的看法。也就是在这时，一封特殊的电报飞向了延安。电文是：

延安，毛润之，学弟勋鉴：

抗日获胜，建国弥艰，万恳应召赴渝，赞襄国政，幸勿固执，致失人望。

张干

1945年8月21日

这位张干早年为湖南一师的校长时，当年正在一师读书的毛泽东与同学联合罢课将其“赶走”，毛泽东也因此被记过处分。此时任湖南省立邵阳六中校长的他拟电时，一位教师认为“固执”一词不妥。他却说：不，身为教师，我是知道毛润之脾气的。最后电报一字未改拍发了出去。

很显然，对张干的电报，我们并不能完全看成是“私怨”之故。由于当时历史条件和本人认识水平的局限，在谁能救中国，谁是中国人民利益的当然代表者这个问题上，张干错误地选择了蒋介石。

新中国成立后，已贫病交加、懊悔不已的张干多次受到毛泽东的关怀，并应约赴京叙旧。

也就是在8月23日这天，毛泽东接到了蒋介石的第三封邀请电。为了争取主动，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

特急，重庆

蒋介石先生勋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敬

正在这时，毛泽东又接到了斯大林的第二封电报，大意是：世界需要和平，中国也需要和平，虽然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

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如果打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你到重庆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

8月25日，毛泽东等部分政治局成员与刚从重庆回来的王若飞，重新研究了毛泽东何时去重庆的问题，并最后决定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一起赴重庆。

8月26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谈了昨晚部分政治局委员商量的结果，并作了解释，他说：“我去重庆的问题，昨晚政治局七位同志同王若飞同志商谈，决定答复魏德迈的电报，去。这样我们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

“现在红军不入关，美国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内战，国际的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

“由于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由于“四个条件”的存在，通过谈判，有可能争取中国民主改革的机会，中国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成立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这种联合政府有几种形式，“其中一种就是现在的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存在相当长的时期。对于这种形式的联合政府，我们还是要参加进去，进去是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于是就发生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问题，即走“弯路”的问题，在走过弯路之后再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如果达不到民主改革的目的，则争取限制内战在一定范围，或推迟内战的全面爆发，并借此机会教育人民，求得政治上的主动。

因此，会议同意毛泽东提出与周恩来、王若飞一同赴重庆谈判的决定。

不管怎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还是有很大风险的，因此，为防不测，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

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并增选陈云、彭真为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说，这样“以便我与恩来出去后，书记处还有5个人可以开会。”对此，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蒋介石把我请到重庆谈判，说要和平，两党联合，和平建国。当时我向党中央作了交代，到重庆后，如果蒋介石把我关了或杀头，那就由刘少奇同志来代替我。”

不过，在毛泽东赴重庆前，尽管全党、全国人民都十分关心他的安全，但他却说：“绝不要怕，”“我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

为防止蒋介石乘谈判期间进攻解放区与人民军队。毛泽东在离开延安前明确指示解放区军民：“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求和平，坚决克服不经过严重斗争而妄想蒋介石发善心的思想。

8月27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与赫尔利乘一架名叫“漂亮姑娘”的飞机抵达延安，他们两人是奉命前来迎接毛泽东的。

8月28日清晨，毛泽东挥手告别举着火把前来送行的人群，与周恩来、王若飞一起乘专机飞往陪都——重庆。

二 重庆谈判，“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

1945年8月28日下午3时45分，陪都重庆九龙坡机场上空响起了马达的轰鸣声，一架草绿色的飞机徐徐降落在跑道上。

机舱门一打开，毛泽东走出舱门。他身穿蓝灰色中山装，头戴深灰色盔式帽，脚穿黑色皮鞋，身材魁伟，容光焕发。他一出现，机场上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张治中为毛泽东逐一介绍了来迎接的重要人士，周恩来向记者们散发了毛泽东的书面讲话：

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国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